

一位中国当代诗人说过,在冬天,我们匆匆走过自己的年龄。而我想说,在冬天,2017年的冬天,我上完了最后一堂课,或者,我的最后一堂课匆匆走过。

课的性质和内容,当然不同于大家熟悉的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。勉强相同的只有一点,那就是着装,都着正装。为这最后一堂课,韩麦老老师“今天穿上了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,打着皱边领结,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。”我呢,也是正装,深褐色隐形条纹法兰绒西装,浅粉色衬衫,绛红色领带。噢,“小黑丝帽”?鸭舌帽倒是有一顶,试了试,活像老间谍片里的间谍;又试了试嵌有“宝岛观光”字样的旅行帽,分明有些滑稽,只好作罢。

我敢保证,整个校园,今天穿西装上课的也唯我一人。“林老师今天有外宾接待任务?”我但笑不语。“不冷?”我且笑且语:“东北雪窝里爬出来的,青岛这点儿冷,简直闹着玩儿的!”是啊,我怎么好说是为了上最后一堂课呢?

每逢过年,是人们阖家团聚、欢乐祥和的时刻。但是,天有不测风云,过年也会碰到伤心事,特别是亲人的离去,抑或是突发的天灾人祸,那又该怎么办呢?

记忆中有件事印象深刻。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,那年春节,同班组老刘的妻子突发疾病去世,留下了丈夫和他们9岁的女儿。老刘的不幸也感染了生产班组的同事。

一天,老刘带来了一包东西,打开一看,是各种做糕团的工具,如做定胜糕的架子,做枣饼时上面刻花的模子,还有一套大红大彩的木盘,专门放做好后准备下锅的糯米圆子……原来,老刘的妻子生前每逢过年都要做许多糕团,除了自家吃,还要送给亲戚、邻居,除夕夜往往要忙个通宵,乐此不疲。

今年的年该怎么过呢?老刘一片茫然,他决定把这些工具都送给同事们,免得见到它们悲从中来。我们的班组长说话声音响,脾气火爆,绰号“大炮”,大家都有点怕他。他要大家把工具收拾起来,放回包里。趁老刘不在的时候,“大炮”和几个人轻声说了几句。

除夕那天,“大炮”带着包,率领三个人去老刘家,大家分工,擀面的擀面,调馅料的调馅料,我当时是组内年纪最小的学徒工,负责把蒸笼洗干

说到西南联大,不能不提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刺的事件。

当时很多教授的子女都在联大附中念书,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、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等。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凌达扬的小儿子凌宏伟也和他们同学。

“那时,联大已经解散了,回北京的飞机票也已经交到闻一多手里了。但在走之前李公朴遇刺,他去参加追悼会,所以就推迟离开了。”凌宏伟回忆说。

闻一多被暗杀的那天是1946年7月15日,凌宏伟的同学庄任秋当时就住在他家中。原本庄任秋要和闻家大儿子闻立鹤一起护送闻一多,后来因故没去。谁知闻一多刚出门,外面就响起了枪声。凌宏伟记得,庄任秋曾告诉他,惶恐之中,众人马上把大门关了起来,他胆子大,是第一个跑出来的,然后就看到了枪击现场。此时闻一多已经不幸罹难。

的电器就是黑板上方的圆形电子挂钟。呃,对了,还有摄像头。此刻,摄像头那黑洞洞深不可测的独眼对着我的双眼,对着我身后的黑板——黑板没擦干净,隐约现出不知是英语还是法语的蛛丝马迹。讲桌满是灰尘,一侧窗帘摇摇欲坠岌岌可危。删节号。动车组。荒野。西装革履。最后一堂课。

讲课。日本文学概论。论已论完大概,最后环节是以文证论,范文赏析。选的是村上一个短篇:《象的失踪》。上周讲了一半,还剩一半。姑且请两位研究生读了两段。一位读得声情并茂,一位读得别扭扭扭,课下一定没好好预习。但我没有批评。最后一堂课,给人留下温馨回忆为好。随后我边读边讲。外语教学,本科生讲语义,研究生讲语境。本科生重在读解,研究生重在赏析。本科生宜举一反三,研究生需以一知十。进而言之,本科生求知,研究生审美,眼前这位,应该说还处于过渡阶段。原著文本阅读量不够,尚未形

再把从药房买来的消毒纱布剪下,铺在蒸笼里……一切都弄妥当,老刘送我们出门,他眼里噙着泪,“大炮”从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老刘的女儿,粗喉咙蹦出了一句:“我们走了,你多休息吧!”

有诗曰: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很显然,如果是亲人逝去,那就会在过年的时候给活着的人带来加倍的伤心。美国匹兹堡有一个机构提出在每年的11月设定一个“儿童悲伤意识日”,让社会各界认知:即将来临的节日对于有至亲逝去的儿童来说,反而是一个加倍伤心的时刻。

有人对小时候失去父亲或母亲的成年人作过分析,平复儿童期的伤亲之痛、重启人生之旅平均需要6年时间,一般而言,大多数人在丧亲3个月以后情绪会好转,但每逢过年过节,痛苦又会加剧。

对于家庭而言,并不希望逝去的亲人被遗忘,但又不能让悲伤永远笼罩在自己的生活中。我有一位同事几年前痛失爱女,每逢过年她都要给女儿写一封信,放进信封,再用黄丝带扎好,逢除夕下午送到女儿的坟上。

有伤亲之痛的家庭如何过年,没有固定的模式,前文所述帮老刘家做糕团过年,固然是一种人性的关怀;如果有的家庭决定把屋子全部搬空,换一种新的过年方式,又何尝不可呢?

如今,联大附中的同学都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,大家看到凌宏伟,还是会叫他当年的绰号“平·克劳斯贝”——他们那个时代著名的美国影星、笑星和歌星。在3年前的校庆活动上,他深情地给校友们唱了一曲老歌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,歌声中大家又想起了他年轻时的样子——瘦高个、英俊、嗓音醇厚,张口就是流利的美式英语。

凌宏伟英语好,当然是条件得天独厚。他的父亲凌达扬当年考取庚款赴美留学,回国后除了在大学任教,还在张学良家当过私人教师,少帅还送过他一匹好马。

尽管父亲是英美文学的权威,但一家人的生活也很清贫,房子是租的,一个月的薪水交了房租买了米就用完了。“父亲上课的时候还提着一个菜篮子,



《西厢记》王叔晖 绘 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版

成良好的语感。而没有良好的语感,便很难进入语境赏析和审美天地。结果,“文学”便可能成为无文之学,成为枯燥乏味的“瘪三”,成为同生命体验、同生活无涉的“概论”,成为纯粹为了获取“文学硕士”的权宜之计……不过这些我已经说过了,不想重复,转而从功利性角度开导几句:本科四年,研究生三年,如果七年都没能真正成为由日语构成的另一世界的“定居者”,而始终止于“观光客”,你不觉得七年亏大了吗?

学生们到底聪明,没有不悦的表示。相反,下课后齐刷刷来我的研究室合影,笑咪咪打出V手势,还要我举手效仿。V? Victory? 这么着,我的三十五年教师生涯至此胜利落幕。

晚上,哲哲创作他的路飞故事时,我就看看闲书。黑柳彻子的《窗边的小豆豆》在我的书架上,我从没把它作为童书来看。一次,自己正在读的时候,小家伙凑过来看,问我

根本不看我的事

张贵勇

一开始,怀疑给他读这本书是不是太早,因为这本书是教育类书籍,而非真正的儿童文学,很大程度上更适合家长阅读而不是孩子。没想到他还能接受,一下子进入情节,似乎化身那个调皮的小豆豆,第一次走进完全不一样的巴学园。

读到小林校长耐心聆听小豆豆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段,哲哲很感动,许是有所共鸣,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。我做出夸张的表情,逗他玩:“啊,连这都能让你感动得流泪?”他急了:“才不是呢,我只是一眨眼,眼泪就自己掉下来了,根本不关我的事!”

突发感想,哲哲和小豆豆,或者天底下所有的孩子,心都是那么纯真、柔软,我真不该拿他的感动开玩笑。

下了课自己要去买菜,回家要自己拖地板。为了多赚点钱,父亲也在补习班兼课,还在家教几个“私塾弟子”。父亲在楼上看书,母亲在楼下喊“吃饭了”,喊三声不下来,兄妹三人会爬上桌子抢着吃,母亲就要护着,这才能给他留下一点。不过对此,父亲凌达扬也无怨无悔。有一次数学家熊庆来问父亲:“你是要去当官还是当穷教书的?”父亲想了想说:“还是当穷教书的吧。”

联大北归时,有几位教授留在了当地的云南大学任教,比如“狂人”刘文典。因为喜欢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,凌达扬也留了下来,直到十多年后才来到上海,在刚由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更名而来的上海外国语学院,参与筹建英语系。凌宏伟则很早就从云南跑出来,先是在文化部下属的音协工作,之后支援

昆明

棋

新疆,因为历史原因经历了许多波折,直到年近50岁才调回上海工作。

“我哥哥是优秀共产党员。”他的兄长叫凌宏焜,曾在联大就读,之后在复校后的清华毕业,成为水利专家,2013年去世。

几年前,独居的凌宏伟把自己家的房子置换了一下。“照顾我的保姆两次救过我的命,我很信任她,自己什么都不管,就最后去签字。”几个月前,凌宏伟被检查出罹患肠癌,保姆一直瞒着他,和医生商量决定要手术前,有点忐忑地把诊断书送到他面前,凌宏伟几乎都没看,就签了手术同意书。手术后,他恢复得不错,又时不时在微信群里给联大附中的老同学们唱起了英文歌。

王叔晖画的是王实甫的崔莺莺,不是元稹的。要搬演或绘写,都得是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不会是元稹的《会真记》。我试着,将我看到的有限的几幅王叔晖画的《西厢》想象成《会真》,竟然毫不困难,因为我没看到结局,它只到“钱行”为止。“钱行”一幅,大有悲意,长亭内端坐的老夫人面带霜雪,亭外,莺莺张生衣带当风,呼应着零落飘舞的红的秋叶。莺莺神色悲戚,她微蹙的眉,无语的唇,喻示的不像是暂别,倒似永别。《西厢》里两人是要团圆的,《会真》则终究不相见了,“为郎憔悴却羞郎”。唯一不甚合的,是画中人物的脸稍嫌红润了些。

莺莺的肤色的红润,在“佳期”一幅中渲染得最好了。莺莺正被红娘推进张生的门,一只脚刚跨过门槛。她含着地回过脸,不自觉地举起衣袖挡在面前,另一只衣袖托着腮,她需要这两重的遮掩,不敢直面打开门的张生。她看的是与他相反的另一个方向,正好让我们看清——她的脸,悠悠红丝白,红是红到眉毛,红到腮边发际,是晕容红,并非大红,额部仍是白皙的,一点樱唇,红得略深,紧抿着。身当此刻,她仍是矜持,步履端庄。开门的张生,他的身姿透露出他的大喜过望,幸而神色不露喜,尚未轻浮失仪。否则他怎么配得起莺莺这跨进门的一步——有谁知道,深闺少女,跨进他的门的这一步有多重。

“自荐枕席”,古典小说中常有的话语,从前我读到,并无特殊感觉,总想象那些女子是平静的,因为羡慕,她们自愿来成全男子的欲望。直到有一年我读到一篇散文《女人:暗夜里的琴声》,里面写道:“她们携带身体最深处最疯狂的欲望,来‘自荐枕席’……”,才提醒了我——她们的内心也是有欲望的,欲望也会是疯狂的,她们自荐枕席,主要还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到巅峰。人一生能有几次巅峰呢?多么难得才碰上这个人呢?谁知道,你还能活多久呢?

辗转思想多时,便来度此良宵。良宵只有一晚。“是夕旬有八日也,斜月晶莹,幽辉半床……”这是不是张生的角度?是就好,压住跟着的一句“张生飘飘然”。而这几句呢:“终夕无一言,犹疑是梦里。及明思昨夜,缕缕是真实。”也是张生的角度,但它更加深情,说是莺莺的角度都够,够贴切。天明,莺莺已去。“及明,睹妆在臂,香在衣,泪光荧荧然,犹莹于茵席而已。”她哭过吗?她哭过。她哭了。你以为她很快乐吗?是会快乐的,但在这个初度的良宵她没顾上。她光是在看你怎么待她就够了。她曾隔窗听你手操琴。女人是什么呢?倘若她也是一张琴,你的手,于她便是调停。

王叔晖先生,是一位被尊称为“先生”的女士。常见的她的肖像,都拍摄于她的老年时期:她面色端凝,正处在一种凝思的状态中,手指间夹着烟,一缕烟雾袅袅升起。她的手指已被熏黑,但事实上她很少去消化烟毒,她抽烟,一天只需一根火柴——作画之前,她点起一根烟,然后迅速入化,在香烟缭绕的画案前慢慢走笔。她在画画,也是在打坐,运气,参禅。时而一惊,烟已将灭,于是接上烟头再点一根。她的心思静极了,她入了一种境。在境中,她跟着崔莺莺,跟着红娘和张生。《西厢记》她先后画过几种版本,从四十出头,到年近七十,她跟随、伴陪了崔莺莺几次。即使在第一次,她看崔莺莺的眼光,也够老了——她四十一岁了,莺莺才十七。四十一去怀想十七——你在做着什么样的梦呢,姑娘。

王叔晖画的崔莺莺,明艳照人而矍铄矜严,优雅端庄,即使是在不能自持的情况下。我不知道王叔晖有无替莺莺揣想过,这良宵过后,等着她的是什么。给她的脚本是《西厢记》,人为地掐断了过度思虑,若肯大而化之,不钻牛角尖,结局便是好的,大团圆。其实对二者来说,良宵都是一个分割线,之前,莺莺的愁是闲愁:“花流水流红,闲愁万种”;之后,她的愁就不那么轻盈了:“自去秋已来,常忽忽如有所失。于喧哗之下,或勉为语笑,闲宵独处,无不泪零……”

良宵是少女的梦的巅峰。魂牵梦绕,终于抵达了,到了实地。而你想过没有,姑娘,在这一最高点过后,你就要从梦境跌落了。

九十抒怀

宋连庠

夕照飞霞颂晚晴,河清海晏乐升平。为圆美梦人康寿,墨趣书香笔劲灵。

她曾朗读“二·一”祭文,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徐婉青

